

近代白族商绅的显亲扬名与社会转聚

——基于大理喜洲匾额文化的探究

王四莲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近代时局动荡, 地方社会的新型秩序重塑牵涉多维度精神空间与现实空间。匾额是义涵丰富的历史文物, 从匾额中可探寻社会历史发展脉络, 窥见地方与民族的精神文化。大理喜洲商绅通过匾额彰显家族社会声望与地位, 谋求自身利益, 希冀得到权力的庇护, 并积极参与社会, 通过匾额传达并形塑着新的价值观念, 他们延展家族事业, 引导地方民众参与社会实践, 成为链接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键人物。

关键词: 匾额文化; 白族; 喜洲商绅; 显亲扬名; 社会转聚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21) 02 - 0121 - 06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21. 02. 019

The Family Renown and Social Gathering of Bai People about Commercial

Gentry in Xizhou County in Modern Times

—Study Based on the Culture of Dali's Xizhou Plaque

WANG Silian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China 430074)

Abstract: Since the turbulence in modern times, Reshaped the new order of local society, involving multi-dimensional spiritual space and real space. The plaque is a historical relic with rich meanings, involving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local and ethnic spiritual cultures. The commercial gentries in Xizhou county of Dali B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showed their family social reputation and status with the plaques in order to seek their self-interests, shelters from the authorities and participation to the society. To convey and shape new values through the plaques, they extended the family business, guide the local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practice and become the key figures of the local and central links.

Key words: plaque culture; Bai people; commercial gentry in Xizhou county; a family of renown; social gathering

刘光瑞的《中国匾额学》^[1]是较为系统的研究著作, 阐述了匾额的历史脉络, 深入解析了匾额的文字、形式以及文化内涵。对匾额颇有研究的林声在《中华名匾》^[2]一书中辑录了唐至民国时期的建筑匾额, 并对匾额历史沿革进行系统论述。张光奇编著的《匾额楹联》^[3]则具体分析民宅、园林等的匾额形式, 但不重视其文化内涵。赵金婕^[4]、钱炜蕾^[5]、窦贤鹏^[6]等以案例阐释了特定区域内的匾额文化, 内容兼及社会关系和道德伦理以及风俗

习尚和生活理念等, 重点突出了匾额的潜隐义涵与人们文化生活的双重复合现象。此外, 李艳华^[7]、周梅清^[8]从匾额的内涵、功能以及价值进行多维度阐释。综上, 匾额文化的研究大多以艺术鉴赏内容为主, 并未深入意识层面, 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拓展。而关于白族匾额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极少, 不成系统且未涉及地方民族文化。因此, 对白族地区匾额文化的研究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通过对白族地区匾额文化内涵的研究, 剖析白族人格特

收稿日期: 2020 - 10 - 10

作者简介: 王四莲 (1991—), 女 (白族), 云南大理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

征和精神气蕴,一方面析了白族文化的内容,重拾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思考;另一方面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强化对匾额等历史文物的保护与重视。

大理喜洲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的集散地,马帮络绎不绝,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至今仍存有体现地区经济文化、精神文化的表征。近代滇缅印之间生活物资的频繁往来繁盛了喜洲诸商号,喜洲商帮成为当时声名赫赫的商帮之一。在经济富足的条件下,人们转而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因此,匾额成为地方人士融合物质与精神层面的载体不断涌现在大众视野中,匾额亦成为各阶层意识形态的“传送带”。由于富强势大,商人参与了社会转型,涵盖着多重身份,在地方社会上形成特殊的商绅阶层。

一、喜洲商绅的缘起

喜洲,古称“大厘城”,是白族先民“河蛮”世居地,从汉代以降至南北朝时期一度是叶榆县治所在地,南诏大理国时期地位仅次于阳苴咩城和太和城^{[9]80},是洱海区域“十睑之一”,人口稠密,商业和手工业发达,南诏王皮罗阁和异牟寻曾在此建立行宫。^[10]大理国时期是北据吐蕃的战略要地,更是佛教传播与商业贸易的重镇。当地民族文化特征显著,是大理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至今仍是白族人口集聚区,由于处在各大路网的枢纽位置,该地贸易交流起步早,辐射范围广,商业底蕴深厚繁荣,滇西北地区早在唐代便流传着“河賧贾客(即喜洲白族先民)”歌谣。徐霞客曾在游记中载:“吾邑唯喜洲一地,人尚勤俭耐劳,具有商业性质”,“喜洲虽大,亦人烟稠密,类多出外经商”,可见当时商业风气已深入人心。^{[9]82}

从历史纵深看,喜洲具有经商传统,古代洱海大姓在喜洲广泛分布,可耕种土地大多被大姓占有,诸多民户无稳定的食物供给和经济来源,外出经商既解决了人均田地占有面积小的现实困境,也为民户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成为新的谋生之道,长此以往产生了“喜洲无农”的说法。此外,喜洲地区的商业发展历经数代的艰苦拓展,逐步从坐商向行商转变,商户增多,涉及面不断外扩,成为一个庞大的商贸体系。许烺光数次对喜洲实地调

查研究,认为喜洲与中国同时期的其他村镇迥然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富商大贾数量之众令人瞠目结舌。喜洲商业的繁荣发展也为地方建设提供了相对雄厚的经济基础,这时期建造了诸多至今保留完整的白族民居建筑群,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对喜洲建筑的描述中写道:“镇里的殷实大户有杨董赵李尹张严诸姓,各家的宅第都是画栋雕梁,轮奂可颂。”^[11]此外,经济流通也带动了地方生活文化的水平。富裕促进了人们对皇赐荣誉、祖宗崇拜和其他传统习俗的追求。^[12]在经济富足的条件下人们转而追求精神文化层面的给养,也有多余的财力去显亲扬名,标明家族身份地位,展现风雅的文化底蕴。“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看,镇外的牌坊,高大、美丽,通体是大理石的,而且不止一座呀!”^{[9]82}字里行间透露出喜洲华美的屋宇布局和文化生活。除牌坊、楼房外,同时期镇内还涌现出一批极具潜隐内涵和象征意义的匾额,至今保存于民户住宅内,体现着地区民族的历史脉络和精神气蕴。

二、匾额的基础意涵

匾额,也称牌匾、扁牍、牌额;我国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作如此释义:“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13]“匾额”初期简义为:题有表示标记或赞扬的字的长方形横牌。林声指出这一定义不能完全概括匾额的内容与功能。^[14]另相关研究领域内还存在着多角度的新定义,认为:表达义理、情感之类的属于“匾”,而表达建筑物名称和性质之类的属于“额”。^[15]结合上述观点,匾额一般悬挂于门屏位置,题字通常表达建筑物的性质、名称,嵌入了房屋建造者或拥有者的人生义理与社会情怀的装饰物,既可作为一种标识指示,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赞扬、谨诫、励志等功能。匾额由匾文、上款、下款三部分组成,具体形式不一,上款和下款统称款识,包括题匾人、受匾人、赠匾人和日期,也印刻题匾者的印章等。室内以木质匾额为主,室外则综合使用了木质和石质两类材质,一般认为匾额从竖式向横向是随着古建筑构件斗拱的变化而转变的,最先只由皇族官宦使用,随后才普及到百姓厅室。匾额内容越翔实具

体,越有利于匾额历史文化的研究。

匾额的缘起较早,在秦汉时便已使用。据《说文解字注》可知,最早的匾额是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萧何题写的“苍龙”“白虎”两块匾额。^[16]《后汉书·百官志》上记载:“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17]古代社会用匾额表彰称“扁表”,能获得朝廷或百姓的扁表都是值得大肆宣扬的荣誉,故而匾额通常置于显眼位置。匾额作为表彰形式在汉代已成制度,往往被附以溢美之词。纪实小说《太平广记》记载了三国韦诞会多种字体且精通题书匾额。魏晋是书法史的跨越点,世家大族争奇斗胜,注重匾额书法展现形式的审美化。唐宋时期,匾额的用途更加广泛,颜真卿的《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涵盖颜氏书法观点,将碑额广而告之于整个国家,颜体雄厚庄严,是匾额使用最广的字体,正所谓“无颜不匾,十匾九颜”。宋代张择端画作《清明上河图》展示了匾额在市井民巷中的广泛使用,充分体现了匾额的商业招牌价值。明清中央集权高度发达,也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匾额形制日益精美完备,并逐渐渗入人们日常生活,其关于礼制风化的教化效用更加突出。明清时期,匾额文化达到蓬勃发展,在各地方志中均有匾额的相关记载和说明。

喜洲匾额历史文化遗存众多,表达内容多样,从社会效益和内容意义看,这些匾额主要分为显亲扬名和社会团聚两大类,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现存匾额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时代特征、社会伦理,有利于反思近代商帮文化以及社会整合的历史现实。

三、喜洲匾额与近代商绅的显亲扬名观

清末“新政”制定了保护商业的法律法规,甚至以爵位奖励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地位提高,士商相混,他们是中央与基层社会的连接点,并在儒家传统教化下在下层社会实现着自己的权威。^{[18]128}商人身份的多重转变反映了近代社会商业的转型,也有利于自身商业发展前景。商人“以富求贵”,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借权力保障自己的利益,这一身份特征决定了他们捐官、做官是其在商界获

得成就后“势所必至”的举动。^{[18]131}

喜洲“四大家族”之一的严家大院门上有“司马第”大理石制阳刻匾,主院大堂正中也有“司马第”的木质匾额,均为繁体字,木匾上款刻有立匾时间“光绪壬午年季秋月初三日”,下款注明“陆峻璋立”。“第”,古代列侯公卿被赐予田宅名为“第”,俗称“大宅子”,往往被冠以“大夫”“司马”“荣禄”等官爵。“司马”是西周始置的中央官职,位列三公,与六卿相当,掌军政和军赋。汉武帝时成定制,为军职。明清时期称“同知”,即衙门佐官,系正五品官衔。严家另一处房产今名“严家民居”内也有一块“大夫第”的大大理石匾,清朝,大夫是朝廷给官员诰赠之衔,诸如朝议大夫、资政大夫等,适合多种级别的官职,为虚衔,无俸禄,“大夫”匾往往不指明大夫具体级别,也不指明主人翁。史载严子珍先祖中有任过千户侯、知县、知府,其子杨克诚曾说:严子珍“一生在清朝捐过‘同知’衔,在民国任过‘顾问’”,^[19]也表明了严家功名匾是严家在家族商业基础上行善扬善后获得名誉的可能性。与此类似的,“进士”木质浮雕匾,上下纹饰二龙戏珠、二龙戏水,造型为大理木雕中典型的龙头凤尾图,刻有蝙蝠、莲花,做工精致,上款“钦云南布政使司命云贵总督部云南巡抚部圣为”,下款“后生张文治立雍正戊申年大吕月吉旦”。“进士”是会试、殿试已登第的举人。据考证,严子珍并未参与科举,祖上也无考取进士的明确记载,图案又富地方特色,应不为政府所造。现藏于董书普宅大门中的“亚魁”木质匾额:黑底金字,上款“第九名举人董相立”,下款注明时间和赐匾者,“亚魁”是指科举考试中乡试第六名。匾额的具体内容充实,明确表达出该匾由下级为上级所刻。大户之家或富贵之流常将展示家族地位身份的匾额挂于显眼的门额位置,一则说明白族重视名誉,二则突出了地方大家族的权重意识。

此外,“邑侯座客”红底金字阳刻匾,上款“特授大理府云南县儒学正堂耿副堂谿为”,下款“光绪二十九年冬月穀旦乡饮宾杨湘立”,中刻龙头及印章,雕纹装饰。“邑侯”指县令,“座客”即座上客,主要展现该家族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是一种地方权威的潜隐表达。与此类似,“圣

恩”匾从字面可知家族受到统治者照拂，既是家族无上荣耀的显现，也表现着某种权威与震慑力。严家匾堂内“乡邦重望”红漆金字木匾，上款“钦命云南布政使司林兵部侍郎云南巡抚部院兵部尚书云贵总督部堂李魏”，下款为“乡饮众宾八品顶戴王显川敬上光绪三十年仲秋月廿五日穀旦”，该匾强调了家族在当地的声望。从赠匾者的性质可获得深层信息，或由乡邦邻里所赠，或由上层职权者所赠予，后者分量更重且具证明性。由“剑川州儒学副堂兼理正堂为太清光緒甲辰年乡饮李四代立”的“名重庶老”匾寓含与“乡邦重望”匾如出一辙，亦属表彰类匾额，这类匾在喜洲极为常见。

匾额标明宅主身份、显示家族兴盛，标榜家族人品德行，也警示后人光宗耀祖，让家族美名世世相传，将自尊自信赋予整个家族的成员。撰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挽鸣声董太封翁文》中说明了经商与家名之间的关系：“乃忽焉而营利者利遂，求名者名成，一转瞬焉而家道迭兴。”^[20]通常情况下，“显亲”与“扬名”相辅相成。许烺光提出白族在祖先庇荫的信仰下对民族人格有重要影响，喜洲白族注重权威并积极参与竞争，而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显亲扬名。在新旧政权更替转型的过程中，商人希望得到政府的表彰，并以此作为一种权力庇护，以富求贵，在拥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或直接捐官买官成为地方权威人物，或从事社会公益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从而促进家族事业的延展。

喜洲一带的富商巨贾，或是“中家”“小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姓名号，代表商业集团的招牌，具体分为字号匾、堂号匾等。堂号匾大多没有分号，全部销路归本堂号所管，比如下关的“大德堂”，这类匾在坊间流传较广。字号类匾早期主要用于说明商号及所属经营范围与店铺隶属关系，随着经营与销路的拓宽，字号名声在各地传播出去，不再挂匾，仅在分店中作特定的说明和表示，因此字号匾通常掌握在大东家中。民国时期喜洲地区商绅所经营的商号有严家的“长春号”和“永春号”、董家的“锡庆祥”、杨鸿春的“鸿兴源”、尹莘举的“复春和”等。在买卖过程中，大多实行认主顾的方式，概言之，商号的名气与信用在商贸交流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注重道德规范、

诚信经营；注重个人修养、提升文化素质。因而，近代迤西商帮被冠以“儒商”之名，兼具儒者的道德与文化，作为从商人士，对社会有崇高的责任感，救世济民，“达则兼善天下”，不仅保证了商业信誉，而且鞭策了地方社会的道德传扬，以及规范了地方社会的经济秩序。民国初期新旧制度更迭，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并非呈现为同步的演变轨迹”^[21]，他们仍能积极地适应并在社会建构上发挥自己的功能。

四、喜洲匾额与近代商绅的社会转聚力

宗族是一个民族的细胞，也是一种社会单位。^[18]^[128]宗族社会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支柱，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础，以继承祖业、光耀门楣、维持宗族的稳定和繁荣为中心内容，提倡“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22]

喜洲现存匾额中祝寿匾的数量极多且内容翔实，体现了尊老敬老的风尚。“寿荣古稀”木质黑漆金字匾边框刻有“圆寿”纹，两侧雕饰“福禄寿喜”四神，上款书“国秀仁翁大人德配周氏孺人古稀誌庆”，下款书“众亲友等同拜祝，宣统元年初昏下浣日谷旦”，是众亲友古稀拜祝匾。院中的“星聚德门”匾是红底金字阳刻雕饰框，上款“诰授奉政大夫前任四川邛州直隶州正堂署永昌府龙陵抚口府袁为”，下款书“例授儒林郎候选州左堂陈安邦立道光三年岁在癸未仲秋月穀旦”，“寿”字纹饰表明该匾为祝寿匾，主要是对尊老敬老的道德模范家庭的鼓励与表彰。民国时期的“松柏寿贞”“极婺双辉”也属祝寿匾。这类匾额大多有松柏、梅花鹿、喜鹊、蝙蝠等象征性动植物纹饰，寓意松柏长青、福禄寿喜。白族推崇“孝”文化，认为“孝”是做人做事的根基，个人应当尽孝，首先便要立德，其次是要孝顺父母，最后再由个人去立身行道，创业扬名。^[23]

白族对祖先非常崇拜，血脉相承凝聚使得人们更加看重家族伦理，民间乡土社会在同一祖先庇荫下不断繁衍而成庞大的宗族。严家大院内的“四代同堂”匾为红漆金字阴刻无框匾，上下款俱全。“四代同堂”指的是一个家族内具有血缘关系的四代人同居，一般就男性而言的祖孙四代。“四代同堂”指的是一个家族内具有血缘关系的祖孙四代

人同居。从古至今，白族村户“四代同堂”是令当地村民羡慕的事，白族火把节时村中竖立的大火把便由四代同堂或五世同堂家庭的长辈点燃，这象征着人丁兴旺、家庭幸福和谐，再者也显现节日习俗中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孙的传统美德。

大理地区自南诏大理国时期便开始重视儒学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取其精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具体内容，不断完善了地区文化。“乡饮宾”匾是红底金字、阴刻与阳刻结合的雕饰匾，上款“钦命云南等处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唐为”，下款“康德盈立大清光绪九年春月吉旦”，在黑色边框上绘直边祥云和缠枝纹，四角雕饰蝙蝠纹样。“乡饮宾”是周制，是乡里贤士的统称，其间分“宾”“介”“众宾”等多等级，旨在使乡人在聚会时能受教化，知长辈、明尊卑，是儒家尊贤敬老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较长的历史时期起到引导社会风化的作用，此外，尚有“道义纲维”匾也说明喜洲商绅在社会活动空间中起着规范作用。

商绅通过匾额为地方有识之士厘定“经世致用”的新目标，引导地方社会人士寻求转型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维度的平衡力。严家书房内的红漆金字阴刻无框“蟾宫待岁”木匾，上款书“誌贺春元胡先生游学之举”，下款是誌贺的亲友名字。古代往往用“蟾宫折桂”形容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之人，“蟾宫待岁”勉励拼搏，学会隐忍，寄寓房主人一腔抱负终能实现，也表明严家重视教育的风气。“书香世美”匾则体现房主人推崇诗书求学，着眼于社会风尚转变，体现儒家社会规范的理想状态，抒发以诗书礼乐教化天下的远大抱负与志向。“源远流长”为黑底金字素平阳刻匾，内容充实，上款“壬申初秋中元节”，下款“旅緬十九代后裔张家鎰通荣教敬立八十二龄十八代孙张绍源书刻撰”。“源远流长，根深者枝茂”，强调自身发展与家族传承要注重其中最本源的内容，注重个人的品性与内涵，注重家族的家风与传统，以此激励自己并警醒后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时代洪流中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

此外，严家庭院门楼的门屏上悬挂着许多题字

匾，这也说明了严家家风注重高雅情操、志存高远等品性。在文人骚客的房屋中，这类匾额最为常见，等同座右铭，多出自名家。“山水清音”素平框阳刻匾，黑底繁体金字，上款“民国庚午之春题绮罗水映寺郡人李根源题”，下款“乡人李怀仁敬立”。“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表达了要形塑个人崇高心灵，要时常融入自然，活跃思维，提升思想境界。另外，这一匾额暗含着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意味，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志同道合的知己有共同的志向，进而有着一致的行为实践目标。匾额透露出民国名士与商绅之间在地方建设的联合，向地方民众传达正确的社会参与，也说明当时救国救民是社会主流意识。近代“进则忧国，退则乐天”的知名人士李根源致力于恤民谋国、勇抗逆流，为共和做出重要贡献。民国时期知名商绅严子珍积极捐资助民、扶持乡里，白族学者赵甲南对此颇多赞誉：“先生，好义之士也。举凡地方公共事业，皆慨捐巨资为之，……”^①。当时商绅重视地方教育，捐资助学，如五台中学、苍逸图书馆等纷纷在边陲小镇内倡设。“保我黎民”黑底金字阳刻无框匾立于清光绪后期，恰逢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也是严家发展势头最强劲的阶段，匾额表达了商绅不仅着力于维护和发展家族事业，还表现出他们胸怀天下，试图拯救民族危亡的自觉。近代云南诸多商帮，尤其是较为富强的商帮视保境安民为己任，他们是联结地方与国家核心地区之间关键人物，引导着地方共同参与到主流的实践活动中，并努力改变地方的社会风化。

五、结语

匾额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审美观，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手材料。匾额文字维系着一个不可见的理想社会空间，并致力于将虚象的精神空间转变为现实的社会空间。匾额作为政府表彰民间的一种方式，是中央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象征了政府对地方的约束。商绅通过匾额宣传以达到“中心”的社会生活与思想实践的“在地化”，政府利用赠匾将权力行使至地方，既维护地方安定，

^①《新建大理史城镇苍逸图书馆记》碑文。由赵甲南撰，王仲杰书碑刻，现位于喜洲镇中心完小校园内。

又使主流的伦理观念在民间弘扬。^[24]喜洲匾额文化展示了喜洲经济繁荣发展的历史景象,体现了白族文化兼容并蓄的特征,揭露了白族将文化教养隐含于生活中,讲究精神世界的追求,重视宗族关系与社会责任,注重权威与信用。通过文化的渗透与传达,强调并重构新时代特征下的公序良俗,敦厚人情世故,达到正德以及转聚社会的效益,在研究拓展过程中有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以丰富的文化形式增强大众的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 [1] 刘光瑞. 中国匾额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3.
- [2] 林声. 中华名匾 [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 [3] 张光奇. 匾额楹联 [M]. 安徽: 黄山书社, 2013.
- [4] 赵金婕. 清代匾额文化研究: 以江西及周边地区为例 [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9.
- [5] 钱炜蕾. 民众生活理想和精神追求的表达和鞭策: 匾额习俗探析 [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6] 窦贤鹏. 民居建筑中的匾额文化探析: 以山东曹县冯庄为个案 [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2.
- [7] 李艳华. 匾额文化初解 [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8 (2): 130-134.
- [8] 周梅清. 匾额: 折射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 [J].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5): 86-90.
- [9] 普艺. 苍洱毓秀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 [10] 云南省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白族社会历史调查 (一)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307.
- [11] 罗常培. 苍洱之间 [M].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118.
- [12] 许烺光. 祖荫下: 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 [M]. 台北: 南天书局, 2001: 18.
- [13] 许慎. 说文解字 册部: 卷二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48.
- [14] 林声. 中国匾文化初探 [J]. 社会科学辑刊, 1995 (6): 120-126.
- [15] 魏凤娇. 建筑匾额: 文化品质的缩影 [J]. 文化, 2006 (1): 152-153.
- [16]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册部: 第四卷 第二篇下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86.
- [17] 后汉书: 卷四 [M]. 范晔, 撰. 李贤,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932.
- [18] 赵善庆. 清末民初云南“商绅”阶层的变动及其与近代商业的转型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 128-131.
- [19] 杨克成. 永昌祥简史 [M]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委员会.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82.
- [20] 杨周伟. 中华白族通史 (公元前三十一世纪——九五六) [M]. 芒市: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6: 533.
- [21] 王先明. 变动时代的乡绅: 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 (1901—1945)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52.
- [22] 王炎松, 白冰, 崔骞. 浅析阳新县祠堂、民居门楣匾额的人文内涵、成因及其影响 [J]. 华中建筑, 2007 (2): 163-165.
- [23] 杨豪, 李小燕. 客家人显亲扬名遗俗种种 [J]. 嘉应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1): 69-73.
- [24] 张留见. 匾额的文化功能研究: 以洛阳匾额为例 [J]. 河南社会科学, 2012 (6): 104-108.

